

——我所认识的耆老——
让思想飞

徐庆全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徐庆全

做编辑也当学者。编辑老，算得上资深；学问浅，学者非著名。研究生和大学任教共八年，研习吐鲁番出土文书。离开学校做编辑后，研究方向转为中共历史，尤其专注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思想史的研究。

著有《知情者眼中的周扬》（经济日报出版社，2003年）；《文坛拨乱反正实录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）；《周扬与冯雪峰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；《风雨送春归——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》（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5）；《革命吞噬他的儿女——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》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09）；《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0）；《他们无时代》（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14）。

编有《周扬新时期文稿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）；《中国经验——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》（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；《亲历30年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8）。

让思想飞

——我所认识的耆老

徐庆全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思想飞: 我所认识的耆老 / 徐庆全著. —石家庄:
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15. 8
ISBN 978-7-202-10670-9

I. ①让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8269 号

书 名 让思想飞——我所认识的耆老
著 者 徐庆全

责任编辑 王 静 陈冠英
美术编辑 李 欣
整体设计 赵 建
责任校对 张三铁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1

字 数 266 000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2-10670-9/I·1097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SEQUENCE

十五岁，在充满着英雄崇拜的年龄，萧克戎马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，满足了我对英雄夸张的想象，他的名字也随之镌刻脑海。

二十岁，因为胡绳的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是课本，所以从旧书摊上看到他的《枣下论丛》和《帝国主义与政治》，很廉价，就买下。想读，读不下去；但因为花了钱，不读觉得亏，就硬着头皮读下去。尽管囫圇吞枣，但胡绳的名字是牢牢记住了的。

二十二岁，赶上“清除精神污染”，批一个叫做于光远的人“一切向钱看”的观点，觉得这个人挺逗——他不能“污染”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只有饭票没有钱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“向钱看”的一族。后来看他的热闹，觉得他在“人体特异功能”这件事和钱学森叫板，很好玩。再后来，买到他的《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》，倒是对他肃然起敬了。

二十三岁，考研究生欣逢免考政治科目，赶上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——至今也就这一遭，因为感念，记住了朱厚泽这个名字。

……

以后的岁月中，我居然能够很幸运地和他们相遇；并且同时又遇上了杜导正、杜润生、李普、王元化……

在遇上他们的时候，我把他们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又一个片段，他们也充分满足了我对于历史的好奇心。

若干年后的今天，我才发现，他们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思想发展谱系中的一个一个索引；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，实际上是为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提纲挈领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写吧……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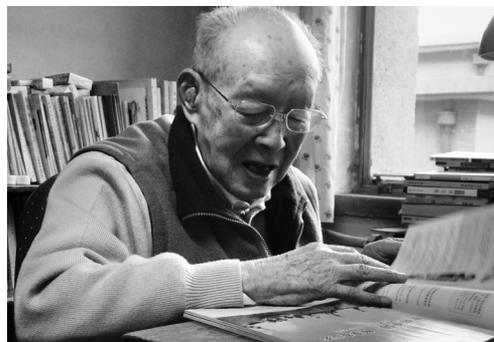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001	仁者、智者周有光（1906-）
017	文人将军萧克（1907-2008）
039	孙冶方：一生坚持学术尊严（1908-1983） 附：我的外公孙冶方——武克钢访谈录
075	戴“三顶桂冠”的季羨林（1911-2009）
087	“三多三少”杜润生（1913-） 附：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——访杜润生
119	“温情”温济泽（1914-1999）
135	我所了解的于光远（1915-2013）
151	报人老胡（1916-2012）
173	此心不与年俱老——记胡绳晚年（1918-2000）
195	坎坷辉煌——冲锋陷阵者吴江（1918-2012）
217	周汝昌：“安安静静地走”（1918-2012）
229	李普：从记者到思想者（1918-2010）
249	“清园先生”王元化（1920-2008）
267	杜导正“人生三境界”（1923-）
295	“三宽部长”朱厚泽（1931-2010）
313	一本书的高华（1954-2011）

仁者、智者周有光

RENZHE ZHIZHE
ZHOUYOUGUANG

周有光（1906— ），原名周耀平，以“周有光”为笔名发表文章，“有光”遂成为其号。江苏常州人。早年主要从事经济、金融工作，做过经济学教授。1955年奉调到北京，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，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，参加并主持拟订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1985年后转入对历史文化的研究，笔耕不辍。百岁过后，先后出版《百岁新稿》、《朝闻道集》、《拾贝集》等数部新作，在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。2007年10月获得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”特等奖。



仁者、智者周有光

2013年1月12日，为庆祝周有光老茶寿的“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”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参与操办这件事的马国川兄早就发出了邀请，但因为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交流时间冲突，错失这一盛会。

看国川传来的会议记录稿，那么多学者与会恭贺，发言那样精彩，陡然想到了赵朴初恭贺日本高僧大西良庆茶寿的诗句：“茶话又欣同，深感多情百八翁，一席坐春风。”想必参与这次盛会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了。

作为周老晚晚辈的人，我有幸和周老有过一次谈话，此后数次见过、也聆听过他的讲话。他的著作《拾贝集》等也赠送给我，读他的作品也算比较多。既然错失老人家的茶寿，撰写本文为老人家庆寿，就理所应当。

周老一生的两个阶段

据记录稿，在“百八”华诞上，周有光因为下楼不便而“缺席”。公子小平先生带来了周老的一段视频。视频中他说：“上帝太忙，把我

忘掉了。”用一句玩笑话来解释自己的长寿。

按照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是：“仁者寿”——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周老年过百八，除了腿有小疾、耳朵有点聋之外，仍然心神健旺，说周老是“仁者”，当无异议。

不过，从夫子的话还可以看出另一层意思。夫子讨论的问题是“知者”（智者）和“仁者”的表象特征。他显然认为，智者的寿命不如仁者。在据说也是夫子语录的《孔子家语》中，夫子也谈到过这一问题。面对着哀公“智者寿，仁者寿？”短短的发问，一向惜字如金的夫子竟然回答了那么一大段，且答非所问，大讲“病杀、刑杀、兵杀”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形，却回避了答案。为何回避？窃以为夫子仍然坚持“仁者”要“寿”于“智者”的观点。

如此说来，夫子对仁者和智者显然有自己的看法。何为“仁”？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。何为“智”？夫子没有成文的解释，只有“动”和“乐”两个字描述。“动”者，“乐”者，是发乎心的举动，自然与“克己”相悖。又显然，夫子是重“仁者”而轻“智者”也。

由夫子的“仁者”和“智者”的划分，我自然就想到了周老。

周有光是百八翁，生命历程长长的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大到国家的大历史，小到个人的小历史，总喜欢分出个阶段来。周老这百年的历史如何分？周老在百岁之后有说法。他在《拾贝集》里说自己是“两头真”：“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，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”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周老也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人家叫作‘两头真’，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，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‘文化大革命’，看法就改变了，苏联解体之后看法更改变了。所以到了老年，重新思考真理，重新追求真理，这是两头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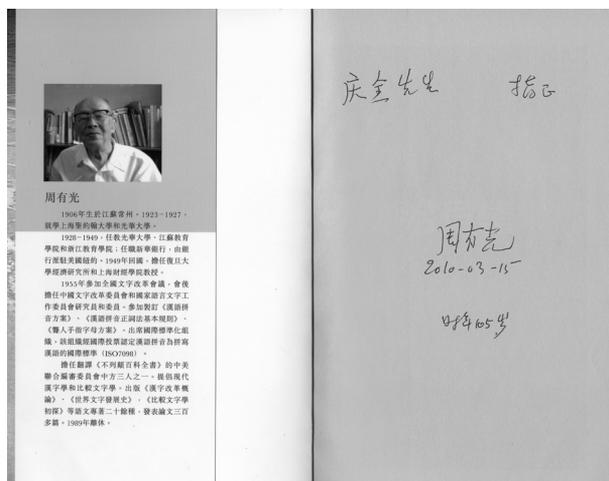


2011年7月18日，《炎黄春秋》20周年庆典，我邀请周老来参加会议。他在会上简短发言时，我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周老这样说，就有学者附和，譬如，闵良臣在《我们有周有光》文中就如此说；在周老百八寿诞上，刘志琴也提到这一点。

何为“两头真”？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我的同事杨继绳。他说：“几年以前，我用‘两头真’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：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，离休以后大彻大悟、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。现在，‘两头真’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。”很显然，百岁后的周老，也接受了这种说法，评论周老的学者也同样接受了这种说法。

我知道，杨继绳发明的这个概念，是受李普一生的经历启发的。所谓“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”，就大致给“一头”框定了范围：即青年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。



周老送给我的《拾贝集：105岁老人的醒世警言》签名本

而周老这“一头”的历史，显然不在这个框定范围之内。读周老的《百岁口述》，我们看不到周老当年对中共有像现今被称之为“两头真”的人物，譬如李普、胡绳、李慎之等人的这前“一头”。当然，后“一头”——“离休以后大彻大悟、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”——周老和他们是一致的。但是缺了前“一头”，就不能称之为“两头真”，周老用这个概念来论及自己，显然就不那么合适；论者随声附和，更是对这个概念的误读。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在贬低周老的历史；也不是说，周老后“一头”真前“一头”就不真。他前一头也是真的，虽然他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过共产党，但你不能说他活得就不真。只是这个“真”和“两头真”的那个“真”的含义不同而已。

其实，在历史上，像周老这样人生经历的人有很多，如沈从文、钱端升、茅以升、冯友兰、陈寅恪、盛振为、朱光潜，等等。1949年以前，

他们基本上是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，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。他们所相信的一点是，不管是哪个党执政，他们的学识对祖国来说都有用。1949年时陈寅恪、盛振为等选择留在大陆是这样的考虑；同样，周有光等人选择从海外回到大陆，也是这样的考虑。他们爱国是真诚的，这毋庸置疑，但你说他们是为爱党或者说是盲从于中共而回来，基本上是“后设叙事”，不符合当年的历史事实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，而且是有别于像李普、李锐、胡绳、李慎之等等那一个群体。

对于后一个群体，杨继绳用的是“两头真”来概括，后来又有人用“延安一代”（“一二九”后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，不包括经历长征的红军和此前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、左翼人士）和“红岩一代”（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，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那一代知识青年，因重庆红岩村是其驻地而得名）来细分，不管是概括还是细分，显然与周有光等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不同。如果硬要给这个群体在1949年前的作为做个总结的话，我倒是觉得用“技术性知识分子”这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前“一头”，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。当然，在1949年后，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，这个群体的人的政治选择不同，命运也各有不同，但一部分人仍然还是“技术性知识分子”，譬如沈从文，譬如朱光潜，譬如周老本人。

相比之下，周有光更典型一些。在《百岁口述》中，周老对自己的历程有过总结：“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”。那就是说，周老是以1988年为界点，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两节的。前一节，周老是在经济和文化改革专业领域耕耘，属于典型的“技术性知识分子”。后一节呢，周老说：“1988年以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滴搞一个段落；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，写杂文。”基本上脱离了“技术性知识分子”这个群体，成为有真知灼见的“人文知识

分子”中的领军人物。萨义德曾对知识分子有个划分：一种是敢于对权势说真理的人；一种是从专业的围墙漂流出来的关怀社会、关心民瘼的“业余人”。周老应该属于后一种。

1988年，周老82岁，离休。按照夫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寿限和夫子的观点来说，当然也是“仁者寿”了；而若以此后20年他散发着智慧之光的精辟见解而言，相对应的可以用“智者光”来概括。

因此，以敝人愚见，从他82岁那一年开始，周老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是仁者的阶段，一个是智者的阶段。简单地概括就是：一仁一智周有光。

仁者周有光

说周有光是“仁者”，“寿”当然是一个标准。

“仁者”何以“寿”？西汉大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说：“仁人之所以多寿者，外无贪而内清净，心和平而不失中正，取天地之美，以养其身，是其且多且治。”认为仁人没有贪欲，内心清净平和而中正，因而多寿。宋儒邢昺的《论语注疏》在注释“仁者寿”时说：“仁者寿者，言仁者少思寡欲，性常安静，故多寿考也。”认为仁者无忧无虑、清心寡欲、性情平静，所以长寿。

读周有光的《百岁口述》，可以印证这一点。

周有光生于1906年，百八的生命历程，亲历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。身处这百年之间，晚年的周老在回忆时，摘掉了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的历史背景的幕布，成为一部简约生动的个人历史。个人的历史，无非是厄运和幸运所交织的人生。但一个人的一生如何对待“运”，

则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智者和愚者差别巨大。百年的人生经历，周老娓娓道来，读时水波不兴，掩卷后再琢磨，书中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芒。

谈到厄运经历，周老框定了二十年、两个阶段。

一是八年抗战那一段，周老全家迁往四川，八年中颠沛流离，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，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，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5岁就夭折了；儿子被流弹击中，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。他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，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，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。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，有时还遭强盗抢劫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上海，身无长物，一贫如洗，只能重新开始。但他一点不沮丧，乐观地面对生活，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，关心社会，与大家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二是“文革”十年那一段，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、湖北和北京。“文革”前他要负担母亲、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、医疗费和学费，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，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。“文革”开始，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。对此他并不太在意，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全家人齐聚了，但原来那点称不上富裕的“家产”已经荡然无存，不仅书籍丢失，连书稿、笔记、照片也统统被毁。“文革”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，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还惨。但他毫不气馁，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。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，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。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。

八年抗战和“文革”十年，是全民族的灾难，但像周老那样在历经灾难后重新创业，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，又能在经济学、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做出成绩的百岁老人并不多。周老说：“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：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’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不

要失望。有两句话我在‘文革’的时候经常讲：‘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’。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，很有道理。季羨林写过《牛棚杂忆》，各种罪名，都不要生气，都不要惊慌。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。我想，首先，生活要有规律，规律要科学化；第二，要有涵养，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要能够‘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’。”他的心态总是阳光的，对未来社会满怀乐观情绪，心态之好，常人难以企及。

论者王志强总结说，周有光的人生，其实是一个“错位”的人生。周老大学毕业时，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，他却选择了学经济；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的毕业生，都到美国留学，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；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，河上肇却被捕了，他只好专攻日语；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，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；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，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；他从小接受的是“传统”教育，却研究了大半生“现代”的知识。面对这样的“错位”人生，周老却很坦然，他说：“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”。

这个总结非常到位。所谓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或者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”的古训，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“错位后的幸运或不幸”。幸运的是，对周老来说，这种“错位”是幸运的。

周老没有选择做外交官，得益于夫人张允和的阻拦——“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，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，主张我搞学术工作”。这一阻拦，不但免却了周老在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的“身份审查”——国民党政府的任职人员在1949年后无一幸免于这种审查，而且使周老进入了前面所言的“技术性知识分子”群体。

周老选择学经济未果，另辟蹊径于语言的世界化，收集了不少语言

方面的著作，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一选择看似不经意，实则是周老对于那时世界现代化困境的一种群体意识的感悟：语言不通，如何与世界沟通？这种感悟，使他觉得搞语言研究可能更甚于经济研究。于是，1955年，他应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，即被留下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担任拼音化研究室主任，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。现今依然通行的“汉语拼音方案”，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人之一。

在周老茶寿寿诞上，曾得益于周老教诲的学者苏培成，总结周老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时说，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外，周老还是汉语拼音证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起草人，汉字信息化处理（拼音输入电脑软件自动转化成汉字）的研制者——这是今天人们较为普遍运用的输入法。

“这个贡献是特别特别巨大的，使我们汉语汉字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”，苏先生评价说。

苏先生是专业学者，专业学者对周老在文字改革的贡献有专业的认知。他特别提到了不大为人所知的周老“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”的贡献，并认为是“对于启蒙教育，对于国家的启蒙运动同样是有重大的发展”的贡献：

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于一个国家，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，各位知道在西欧，在文艺复兴之前是由语文改革开始的引导西欧的进步，引导到西欧的产业革命。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也是由语言文字的改革，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作为启蒙时期是由新文化运动开始的，首先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，这就是语文改革。五四时期，接着就是文字改革，让我们的文字简易化，这些历史事实证明语文的研究跟国家的发展不是没有关系，而是关系非常密切。我体会周老致力于语文现代化的研究，他从这个角度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，周先生研究了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语文的发展，他把它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，我个人觉得在这